

从亚非团结到全球南方合作： 万隆精神的规范演进与当代价值^{*}

潘 玥

内容提要 作为后殖民时代亚非国家争取独立的历史性会议，1955 年万隆会议确立的万隆精神经历了从区域规范到全球指导原则的演进历程。本文通过结合规范理论与历史分析，考察万隆精神从亚非团结理念向全球南方合作规范转化的内在逻辑，发现万隆精神的规范演进遵循“主体塑造—平台扩散—制度内化”的三重路径：亚非发展中国家作为规范创新者通过本土文化资源与国际政治需求的创造性结合，提出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规范框架；多层次多边平台构建了从亚非区域向全球扩散的规范传播网络；通过政策转化、制度建设和实践创新实现了从理念到行动的规范内化。在大国博弈加剧、单边主义抬头的当下，万隆精神为发展中国家维护战略自主、推动制度创新、应对全球挑战、重构国际话语提供了重要指引。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新兴领域，万隆精神展现出从政治共识向技术协同、从理念倡导向行动合作的范式跃迁，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支撑。

关键词 万隆精神 规范演进 全球南方 南南合作
国际秩序

作者简介 潘玥，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印尼研究中心副主任（广州 510632）。

^{*} 本文为 2025 年度广东省社科联青年学术工作坊“从万隆精神到数字互联：广东推进中印尼新时代产业合作的路径研究”（2025GZF05）的阶段性成果。

从亚非团结到全球南方合作：万隆精神的规范演进与当代价值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关口，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深刻指出，中国“始终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① 这些重要论述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指明方向，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和弘扬万隆精神提供了新的时代坐标。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思潮涌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愈发显示出其破解现实困境、引领未来方向的思想力量。作为国际规范的万隆精神是如何从亚非区域性合作理念发展为全球南方合作指导性原则的？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万隆精神对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有何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历史分析与规范理论，系统考察万隆精神的历史演进轨迹，分析其从亚非区域性合作理念向全球南方合作规范转化的内在机理，并探讨其对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现实意义。在国际秩序加速重构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万隆精神的历史底蕴与当代价值，不仅有助于丰富国际规范理论在非西方语境下的应用研究，也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规范构建实践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为探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作为二战后亚非国家首次大规模政治集会，1955 年万隆会议不仅标志着后殖民时代亚非国家争取政治独立、经济自主的集体觉醒，更开创了

①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 年 10 月 1 日，第 2 版 《共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亚太经济——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5 年 11 月 1 日，第 2 版。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谋求平等地位的先河。^① 随着国际格局持续演变，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已从最初着眼于亚非区域加强团结的理念引领，逐步发展成为指导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多边合作的基本准则。这一演进过程折射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谋求公平正义的持续努力，也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国际规范建构的创造性贡献。

学界对万隆会议及万隆精神的研究已形成丰富的学术积累。在历史研究维度，学者们主要聚焦会议的时代背景、进程及其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作用。西方学者如艾哈迈德·乌马尔（Ahmad Rizky Mardhatillah Umar）认为，万隆会议是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在冷战对峙格局下寻求“第三条道路”的战略选择。^② 非西方研究者如印度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新加坡学者谭世成（See Seng Tan）则强调，万隆会议倡导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原则对亚非国家关系有重要规范意义。^③

在理论研究层面，国际关系学者从规范建构视角对万隆精神进行深入解析。阿米塔夫·阿查亚提出的“规范本地化”（norm localization）理论认为，万隆会议是非西方国家对国际规范的在地化实践。^④ 印尼学者里扎尔·苏克马（Rizal Sukma）指出，万隆精神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仍然具有重要启示。^⑤ 中国学者郑先武的研究表明，万隆会议确立了协商一致的共识性决策程序，形成特定的“亚洲方式”，将不干预、主权平等、和平相处、不结盟、非正式等原则作为核心规范。这些规范与求同存

① Ahmad Rizky Mardhatillah Umar, "Rethinking the Legacies of Bandung Conference: Global Decolon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Order," *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 Vol. 11, No. 3 2019, p. 461.

② Ibid.

③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Introduction: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 - 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pp. 7 - 11.

④ Ibid.

⑤ Rizal Sukma, "The Evolution of 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 An Indonesian View," *Asian Survey*, Vol. 35, No. 3, 1995, pp. 304 - 315.

从亚非团结到全球南方合作：万隆精神的规范演进与当代价值

异原则以及“团结、友谊、合作”理念一起，构成万隆精神的核心内涵，并在此后的东盟发展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实现了“万隆规范”向“东盟规范”的转化。^①

非洲学者对万隆精神的研究同样作出重要贡献。尼日利亚学者乔尔·阿德耶耶（Joel Adelusi Adeyeye）对非洲统一组织（OAU）宪章与非洲联盟组织法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两者都继承了万隆会议的核心精神，特别是在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等方面。^② 南非学者则强调万隆会议对非洲去殖民化进程的推动作用，认为万隆精神为非洲国家独立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国际支持。^③ 拉美学者也从南南合作的视角分析万隆精神的全球扩散，指出 77 国集团的成立深受万隆会议影响，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团结协作。^④

然而，已有研究仍然存在若干值得深化的空间。第一，倾向于将万隆精神视为一个静态的历史概念，对其从区域性合作理念向全球性规范动态演进的关注不足。尤其是在多极化背景下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如网络安全、全球供应链治理和跨境公共卫生合作等新议题中，对万隆精神的当代适配性尚缺乏系统探讨。第二，在探讨万隆精神的当代影响时，较少从规范扩散与制度创新的理论视角分析其对全球南方合作机制构建的指导作用。事实上，全球南方国家正通过自主定义国际议程，完成从国际规则的被动追随者向主动规则塑造者的角色转变，这一转变的起点可追溯至万隆会议，它本身就是一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叙事重构。第三，在大国战略竞

① 郑先武 《万隆会议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9 期，第 31—58 页。

② Joel Adelusi Adeyey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arte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 and the Constitutive Act of the African Union (AU),” *Groning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 No. 2, 2018, pp. 215–241.

③ 孙翔 《西佐·恩卡拉：溯源中非友好，从万隆会议到新时代合作》，中国新闻网，2025 年 7 月 29 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5/07-29/10455613.shtml>，访问时间：2026 年 1 月 10 日。

④ André Luiz Reis da Silva, Alexandre Piffero Spohr and Isadora Loreto da Silveira, “From Bandung to Brasília: IBSA and the Political Lineag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3, No. 2, 2016, pp. 167–184.

争加剧的背景下，万隆精神作为包容性国际规范，对促进国际秩序转型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也亟待更为系统的阐释。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引入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凯瑟琳·西金（Kathryn Sikkink）的“规范生命周期”（norm life cycle）理论框架^①，将万隆精神的演进历程划分为规范生成、规范级联和规范内化三个阶段，以考察其从区域性理念向全球南方合作规范转化的动态过程。同时，借鉴阿米塔夫·阿查亚的“规范本地化”概念^②，关注万隆精神在传播至不同地区时，如何与当地既有规范互动并实现适应性重构，从而避免将规范扩散简化为单向“输入—接受”过程。以此更深入地理解万隆精神从亚非区域理念演变为全球南方合作规范的内在逻辑，也为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持续发挥作用提供了分析基础。

万隆精神的内涵与规范演进历程： 从反殖民主义到全球发展合作

1955 年 4 月 18 日，来自亚非 29 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印尼万隆，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亚非会议。^③ 这次会议不仅是亚非国家团结自强的新起点，更确立了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规范体系，即万隆精神。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独立国家的共同主张，万隆精神深刻影响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塑进程，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谋求平等地位和发展权益的重要指导原则。万隆精神的规范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际形势及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变化不断丰富和拓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

①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887–917.

② Amitav Acharya, “The R2P and Norm Diffusion: Towards a Framework of Norm Circulation,”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Vol. 5, No. 4, 2013, pp. 466–479.

③ 《国际组织与会议（1985 年第 1—12 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 1985 年版，第 18 页。

（一）第一阶段（20 世纪 50—60 年代）：反殖民主义与政治独立的规范确立

万隆精神的规范生成根植于亚非团结的历史背景。二战结束后，世界秩序经历了重大转变，殖民体系瓦解和新兴国家诞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开启。亚洲和非洲国家面临相似的挑战：摆脱殖民统治的遗留影响，实现国家独立与发展。于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运而生，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在万隆会议上，尽管与会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但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各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在内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万隆精神是一个完整的规范体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其重要内容，强调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① 这些原则不仅为亚非国家交往确立了基本规范，更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提供了可行方案。

求同存异与平等协商也是万隆精神的核心要素。在会议召开前夕，参会国家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以埃及、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国家倡导积极中立，主张与两大阵营保持等距离；以泰国、菲律宾为代表的国家则倾向于加入西方阵营；土耳其已加入北约。同时，各国在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上也存在显著差异。面对这些复杂的分歧，周恩来总理提出“求同存异”的建议，得到苏加诺、纳赛尔等与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② 印度和中国等主要参与国无意将会议变成反西方论坛，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推进议程，在敏感议题上尊重各方，通过反复磋商和妥协达成共识。^③ 这种

① 刘恩东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经验、时代意蕴与重要旨归》，《当代世界》2024 年第 10 期，第 26—27 页。

② 李连庆 《大外交家周恩来》（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9 页。

③ Amitav Acharya, “Studying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rom a Global IR Perspectiv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0 No. 4 2016 p. 345.

平等协商的方式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它超越了传统国际会议中强权主导的决策模式，确立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新范式，并且为此后不结盟运动、77 国集团等多边合作平台提供了重要借鉴，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基本模式。

在价值理念层面，万隆精神强调文化多样性与反殖民主义的双重取向。会议明确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印尼总统苏加诺在会议开幕词中就强调，“所有的声音都应该被倾听，所有的文明都值得尊重。”^①这不仅是对西方殖民体系的历史清算，更是对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建构。万隆会议对非洲独立运动也产生深远影响，非洲国家的反殖民诉求与亚非团结议程相结合，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支持。

这一时期，随着印尼总统苏加诺提出的“新兴力量”理念和埃及总统纳赛尔倡导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万隆精神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动。亚非新兴独立国家通过万隆会议、第一次不结盟运动会议（1961 年）等重要外交活动，推动反殖民主义斗争深入开展。万隆会议通过确立反殖民主义规范并形成自主发展的集体认同，成为触发 20 世纪 50—60 年代非洲独立浪潮的催化剂，其规范扩散效应在会议后 8 个月内即转化为具体的去殖民化实践，如 1956 年苏丹、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国的独立进程直接受益于万隆精神的国际法理支撑和政治动员作用。^②1963 年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其精神内核与万隆会议一脉相承，都强调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殖民主义等核心原则。

① “Pidato Selamat Datang Bung Karno pada Pembukaan KAA 1955,” Koran Sulindo, April 19 2022, <https://koransulindo.com/pidato-selamat-datang-bung-karno-pada-pembukaan-kaa-1955/> accessed January 16 2026.

② 叶平凡、许嘉桐 《万隆精神历久弥新——写在亚非会议召开 70 周年之际》，《参考消息》2025 年 4 月 17 日，第 8 版。

（二）第二阶段（20 世纪 70—80 年代）：经济自主与南南合作的规范拓展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大多数亚非国家实现政治独立，万隆精神的规范内涵开始向经济领域扩展。在石油危机和“南北对话”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意识到政治独立必须以经济自主为基础。1974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集中体现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后团结起来，共同倡导经济去殖民化以及加强贸易、金融和技术等领域国际合作的美好愿景。^① 这一宣言的通过标志着万隆精神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延伸。

发展中国家开始系统性地挑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要求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万隆会议确立的“促进相互经济利益”原则在这一阶段进行了具体化和制度化实践。77 国集团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推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加强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从 70 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开始寻求在经济、技术和社会领域内的合作，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并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通过建立如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OSSC）等机构，南南合作得以制度化，并在全球发展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

在非洲，万隆精神推动了地区一体化进程。1980 年《拉各斯行动计划》的通过，标志着非洲国家开始探索经济合作的具体路径。非洲统一组织在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合作、协调发展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万隆精神中互助合作理念在非洲的具体实践。

（三）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全球发展合作与多边治理的规范深化

冷战结束后，南南合作一度陷入低谷，随着两极格局瓦解，西方“历

^① Umut Özsu *Completing Humanity: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Decolonization, 1960–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106.

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集体影响力有所下降。但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非合作论坛（2000 年）、上海合作组织（2001 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006 年）等南南合作机制相继成立，南南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些机制的建立，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开始构建更加制度化、更具实质性的合作平台。

中非合作论坛创立也是万隆精神的重要实践创新。作为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集体对话机制，中非合作论坛秉承万隆精神的平等互利原则，在经济合作、能力建设、和平安全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论坛每三年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并且举行了四次峰会，建立了包括高官会、非洲驻华使节与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等在内的完整机制。这种制度化的合作模式，为万隆精神在新时代的实践创新提供了重要平台。

2010 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标志着金砖合作范围扩展到非洲，也是对万隆精神的传承和创新。南非作为非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和地区性大国，加入金砖国家使得该机制真正实现了横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全球南方代表性，不仅增强了金砖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也为非洲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提供了新的渠道。^① 南非通过金砖合作平台，加大了非洲议程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彰显万隆会议倡导的团结协作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南南合作呈现出新的特征。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发展中国家展现出更强的合作意愿和行动能力。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揭示了国际公共卫生体系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万隆会议倡导的南南合作机制在抗疫实践中展现出独特的治理效能，这种基于共同发展诉求的互助模式突破了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的局限，为构建更加公平的全球卫生治理秩序提供了替代性路径。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基础四国”（BASIC）

① 赵晨光 《“金砖”扩容与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探析》，《中国非洲学刊》2024 年第 1 期，第 15—16 页。

从亚非团结到全球南方合作：万隆精神的规范演进与当代价值

的协调机制有效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影响力。^①

在制度创新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型国际合作框架，通过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等务实举措，为落实万隆精神提供了新平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开发银行（NDB）的建立，则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制度性创新。非洲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开展基础设施合作，如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埃塞俄比亚的亚吉铁路等项目，都是“团结、友谊、合作”万隆精神的具体实践。

全球南方话语的形成是万隆精神规范扩散的直接结果。随着南南合作深入发展，全球南方的话语体系逐步形成。这一概念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地理界限，更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共同立场和利益诉求。全球南方话语的形成，使万隆精神从区域性规范发展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话语资源。

万隆精神规范演进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

万隆精神作为亚非会议的重要成果，不仅是一种历史遗产，更是一种持续发展的动态规范体系。理解万隆精神如何从区域性合作理念演进为全球性规范，需要深入分析其演进的动力来源和实现路径。本部分将从规范生成的主体塑造、规范扩散的平台支撑、规范内化的制度转化三个维度，系统阐释万隆精神规范演进的内在逻辑。

（一）规范生成的主体塑造：发展中国家规范创新者角色

规范的生成与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主体塑造、理念构建和制度传导等多重维度。万隆精神作为一种国际规范，其生成并非由单一

^① 《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4年7月24日，https://www.mee.gov.cn/xxgk/hjyw/202407/t20240724_1082427.shtml，访问时间：2026年1月25日。

国家主导，而是亚非新兴独立国家作为“规范创业者共同体”协同推动的结果。印尼凭借东道国身份，将本土协商文化注入会议议程，为“求同存异”提供了程序性框架；中国、印度、缅甸等国则将其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会议的核心政治基础；中国在会议陷入分歧时提出“求同存异”方针，有效弥合了阵营对立与意识形态差异。这些力量汇聚使万隆精神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超越单一国家意志的集体权威。

更为关键的是，以埃及、加纳为代表的非洲国家将反殖民主义与种族平等的迫切诉求带入会议，使反对殖民主义从一般性外交原则升华为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核心规范。1955 年万隆会议召开时非洲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但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等已独立的非洲国家积极参会，坚持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尚未独立地区的民族解放问题列为会议优先议题，将反殖民诉求纳入亚非团结议程，才使万隆精神具备了解放被压迫人民的实践指向。特别是以埃及总统纳赛尔、黄金海岸（今加纳）总理恩克鲁玛为代表的非洲领导人，在万隆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会议明确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立场。非洲国家参与使万隆精神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跨地区的代表性和普适性。此外，锡兰（今斯里兰卡）等中小国家在会议中积极斡旋，也证明了规范创新者并非只有大国，中等国家甚至小国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万隆精神的规范生成本质上是亚非多国在特定历史节点上议题交融、话语协同的结果。多方力量汇合使万隆精神超越了任何单一国家的战略意图，成为第一个真正由全球南方多国共同定义的国际规范。而从规范生成过程来看，万隆精神经历了从观念凝聚到规范确立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主要通过三个机制实现：其一是认知框架的构建，即通过签署《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和《万隆宣言》，明确界定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价值诉求，形成规范的认知基础；^① 其二是行为准则的确立，即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精神等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指南；其三是制度约束的形

① 裴坚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5 页。

从亚非团结到全球南方合作：万隆精神的规范演进与当代价值

成，即通过多边协议和组织章程等形式，将规范要求固化为制度安排。比如 1963 年《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将万隆精神的核心原则写入其宗旨，^① 2009 年《东盟宪章》进一步将协商一致、包容性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等理念制度化。^② 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使万隆精神从单次会议的临时共识，逐步沉淀为具有约束力和持续影响力的国际规范。随后，通过不结盟运动、77 国集团等，这一规范进一步扩散至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地区，拉美国家也成为规范的接受者、传播者和再创造者，共同完成了万隆精神从“亚非共识”向全球南方规范的历史性跨越。

（二）规范扩散的平台支撑：多边机制的传播网络

万隆精神从亚非区域向全球扩散，离不开多层次多边外交平台的支撑。这些平台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强化的传播网络，推动万隆精神的规范影响力不断扩大。

不结盟运动是万隆精神规范扩散的第一个重要平台。1961 年贝尔格莱德会议召开，标志着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这一运动直接继承了万隆会议的精神遗产，将和平共处、不结盟、反对霸权主义等原则进一步系统化。通过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等多层次会议机制，不结盟运动实现了万隆精神的垂传播。从地理范围看，不结盟运动将万隆精神从亚非地区扩展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使其成为覆盖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规范体系。

77 国集团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协调机制，为万隆精神在世界经济领域的传播提供了制度化渠道。1964 年，77 个发展中国家在日内瓦召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七十七国联合宣言》，标志着 77 国集团诞生。该集团将万隆精神中的“促进相互经济利益”原则具体化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系统主张。通过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行动，77 国集团推动万隆精神从政治宣示转化为经济政策诉求，实现了规范内涵的横向拓展。

①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 *Charte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1963, p. 67, <https://www.refworld.org/legal/constinstr/oau/1963/en/20810> accessed January 26 2026.

② 林永亮《东亚主权观念：生成方式与秩序意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3 页。

区域组织在万隆精神的规范适配和深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东盟将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协商一致等理念与东南亚地区传统文化结合，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东盟方式”（ASEAN Way）。1976 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将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法律化。^① 非洲联盟同样在决策机制方面体现了万隆精神。非盟采用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强调“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原则，在和平安全领域建立了非洲待命部队（ASF）、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等机制，在一体化领域推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建设。^② 这些实践表明，万隆精神在不同地区的本土化过程中，既保持了核心价值的一致性，又展现出适应地区特点的灵活性。

（三）规范内化的制度转化：从理念到实践的三阶段路径

万隆精神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过程，体现了规范内化与制度化的双重特征。从规范理论视角来看，这一过程经历了规范接受、规范适配和规范内化三个阶段。

在规范接受阶段，发展中国家对万隆精神的认同主要体现在政治宣言和外交表态层面。1961 年不结盟运动贝尔格莱德会议、1964 年 77 国集团日内瓦会议等重要外交场合，均明确援引万隆精神，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等理念纳入政治宣言。这种规范接受源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处境：在冷战格局下维护独立自主，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争取发展权益。万隆精神提供的规范框架，为发展中国家表达共同诉求、协调共同行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继而在规范适配阶段，各国和地区组织根据自身实际对万隆精神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这种适配过程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将普遍性原则与地区特殊性结合。东盟的实践最具代表性，将万隆会议倡导的协商一致原则发展为

① Alice Darlene Ba *ASEAN's Ways: A Study o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Regional Idea in the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Virgini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0, p. 60.

② 关培凤、孙小涵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理念更迭及其本土实践研究》，《非洲研究》2023 年第 1 卷，第 3—18 页。

从亚非团结到全球南方合作：万隆精神的规范演进与当代价值

“东盟方式”，强调非正式协商、灵活渐进、照顾各方舒适度。非盟同样将万隆精神与非洲传统的乌班图（Ubuntu）理念结合，强调集体主义和互助精神。二是将静态原则转化为动态机制。万隆会议确立的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在东盟框架下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机制，如1976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建立的高级理事会机制、东盟地区论坛（ARF）的预防性外交机制等。

在规范内化阶段，万隆精神逐步转化为各国和地区组织的具体制度安排和行为准则。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三个机制实现：一是政策转化机制，即将万隆精神的原则要求转化为具体政策措施。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倡议等继承和弘扬万隆精神的实践，体现了将互利共赢理念转化为基础设施合作、产能合作等具体项目的政策创新。二是制度建设机制，即构建相应的组织架构和运行规则。如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AICHR）、非盟人权民族权法院的建立，都体现了在人权问题上的“求同存异”原则。^①三是实践创新机制，即在具体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万隆精神。如东盟在处理南海问题时采用“双轨思路”，非盟在调解非洲内部冲突时坚持“非洲解决方案”，都是对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创新性运用。

同时，规范内化与制度化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而不断调适。例如，在数字经济时代，亚洲—非洲数字创新桥（AADIB）项目将万隆精神的互助合作理念延伸到数字领域；在新冠疫情期间，中非团结抗疫不仅生动体现了团结合作的万隆精神，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写照。当前，求同存异原则已从万隆会议的策略性协调演化为全球南方国家间制度化合作的核心规范，其内涵体现为在承认发展模式多元化的前提下，通过议题聚合机制在共同面临的结构性挑战领域构建合作框架，从而实现从策略性协调向规范性治理的转型。^②

① Dinah Shelton and Paolo G. Carozza, *Reg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Pa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72.

② 李志全《为何说万隆精神历久弥新？——专访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关系特别顾问乔娜·维达格多·普特丽》，中国新闻网，2025年5月24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dxw/2025/05-24/10421491.shtml>，访问时间：2026年2月5日。

万隆精神的当代价值：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与推动国际秩序变革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重构。在战略层面，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构建新的地区乃至全球秩序，试图将地区合作纳入大国竞争的轨道；在经济层面，发达国家通过“友岸外包”、产业链重构、保护主义等举措重塑全球价值链，使许多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产业转型压力；在技术领域，大国竞争导致技术民族主义抬头，对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构成严峻挑战；在制度层面，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权力不对称问题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仍然不足。在此背景下，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指导原则，万隆精神为应对上述挑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实践指引。

（一）战略自主：在大国博弈中维护发展空间

万隆精神为发展中国家维护战略自主提供了重要的原则基础和实践路径。在安全领域，非洲国家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为核心，依托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确立集体安全机制，坚持“非洲问题非洲解决”原则，维护地区安全事务自主权；东盟国家则以“东盟印太展望”重申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架构，既回应美国的“印太战略”，也与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形成积极互动。这些实践均体现了万隆精神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当代运用。

在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多元化战略，既保持自主发展又强化务实合作。南非在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积极推动扩员，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集体影响力。^①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非洲国家与中国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既促进了自身发展，也避免了对

① 赵晨光 《“金砖”扩容与非洲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化探析》，第4—5页。

从亚非团结到全球南方合作：万隆精神的规范演进与当代价值

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这是万隆精神中经济自主原则的实践创新。

在应对技术封锁方面，万隆精神倡导的技术共享和互助合作理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替代路径。2025 年 4 月举办的“万隆精神与全球南方共同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设立“AI 与全球南方数字未来”分论坛，体现了数字时代全球南方国家对技术自主权与包容性发展的集体诉求，实现了万隆会议倡导的团结合作精神在新技术语境下的范式延续。^① 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持。

（二）制度创新：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方面，万隆精神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从理论层面看，万隆精神强调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为重塑国际关系提供了规范基础。这些原则不仅体现在联合国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民主化改革的努力中，也反映在区域治理的具体实践中。

从实践层面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开发机构的建立，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垄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融资选择。这些机构在治理结构和业务模式上的创新，展现出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决心和能力。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采用平等投票权机制，总部设在上海，非洲区域中心设在南非，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南南合作的平等性和包容性。2023 年大幅扩员的“金砖+”机制，体现了万隆精神的包容性多边主义，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平台。

中非合作论坛是万隆精神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另一重要实践。论坛建立了包括峰会、部长级会议、高官会等在内的完整机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广泛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特别是在联合国改革、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上，中国与非洲国家密切协调立场，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

^① 《纪念万隆会议 70 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印尼举行》，《人民日报》2025 年 4 月 26 日，第 2 版。

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制度化的合作模式，为万隆精神的新时代实践提供了重要平台。

在全球治理议程设定方面，万隆精神在三个维度上发挥实质性影响。在议题框定上，万隆精神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理念激励发展中国家力争将发展权、减贫等核心关切纳入全球治理议程。如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并确保将消除贫困作为首要目标，就是这种影响的具体体现。在规则制定上，万隆精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共同的价值基础。如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共同推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完善。在新兴议题上，万隆精神的包容性原则为各国寻求共识提供方法论指导。

（三）团结协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集体行动

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万隆精神的协调功能得到新发展。在气候变化领域，“77 国集团和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BDR），推动建立“全球适应目标”“损失与损害基金”等机制。^① 非洲国家的集体行动尤为突出：非盟通过非洲气候变化委员会协调成员立场，在 COP27 会议上成功推动“损失与损害基金”的建立，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到更多支持。^② 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万隆精神中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即强调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历史责任。

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新冠疫情期间建立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非洲疫苗生产倡议”（AVMI）等机制，都体现了南南合作的创新发展。全球疫情蔓延揭示了国际公共卫生体系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发展中国家通过南南合作机制开展疫苗研发、生产和分配合作，突破了西方主导

① 张海滨等 《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五洲传播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9 页。

② 张春、刘扬 《非洲“再次觉醒”与自主现代化道路探索》，《西亚非洲》2026 年第 1 期，第 51—52 页。

从亚非团结到全球南方合作：万隆精神的规范演进与当代价值

的“疫苗民族主义”。^① 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疫苗援助，支持非洲发展本地生产能力，是万隆精神中互助合作理念的具体实践。

在数字经济治理中，发展中国家通过“数字丝绸之路”、《东盟数字总体规划 2025》、非洲大陆数字化转型战略等，积极参与数字规则制定，推动建立更加包容的数字治理体系。^② 面对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发展中国家基于万隆精神的平等合作理念，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的数字化路径。中国与非洲国家在电子商务、数字支付、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通过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帮助非洲国家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四）话语重构：提升全球南方的国际影响力

万隆精神的当代价值还体现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自主话语体系方面。长期以来，国际话语权主要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被边缘化。万隆精神通过强调文明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元化，为发展中国家构建自主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正是这种话语重构的重要体现。这一概念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地理界限，更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共同立场和利益诉求。

在国际规范塑造方面，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规则被动追随者向主动规则塑造者转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四大全球倡议”都是对万隆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有别于西方霸权逻辑的替代性方案。这些倡议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与万隆精神倡导的平等协商、团结合作高度契合。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发展中国家通过协调立场、集体发声，有效提升了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

在发展模式探索方面，万隆精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道路自信。西方长期鼓吹的“华盛顿共识”曾被视为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但发展中国

① 潘玥 《从双边到多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新冠疫苗合作》，《东南亚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149—152 页。

② 孙广勇 《深化与东盟各国的数字技术合作》，《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 年 4 月 16 日，第 5 版。

家的实践证明，发展道路不是单一的，各国完全可根据自身国情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非洲国家也在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如卢旺达的“愿景 2020”、埃塞俄比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等，都体现了发展道路多元化的趋势。万隆精神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鼓励发展中国家坚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被西方模式所束缚。

结 语

万隆精神规范的演进，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主体性建构的全球叙事再生产。作为源于亚非团结的国际规范，其价值转化经历了反殖民主义与政治独立的规范确立（20 世纪 50—60 年代）、经济自主与南南合作的规范拓展（20 世纪 70—80 年代）、全球发展合作与多边治理的规范深化（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三个阶段。这一不断演进的深层动力根源在于，万隆精神始终以发展中国家的群体诉求为核心，即在殖民体系瓦解时期表现为争取独立自主的政治抗争，在全球化时代转化为发展权博弈的规范工具，而在大国竞争加剧的当下则升华为重塑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资源。

从演进逻辑来看，万隆精神的规范扩散遵循三重动力机制：其一，以中国、印尼和埃及为代表的亚非发展中国家作为规范创新者，通过将本土文化资源与国际政治需求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符合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规范模式；其二，多层次多边平台构建了规范传播的网络通道，推动万隆精神从亚非区域向全球扩散；其三，规范的持续生命力源于其与实践需求的互动，通过政策转化、制度建设和实践创新，万隆精神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三重机制相互关联、相互强化，共同推动万隆精神由区域性规范向世界性规范演进。

从实现路径来看，万隆精神经历了规范接受、规范适配与规范内化的渐进过程，从政治宣言层面的认同，到与地区特色的创造性融合，再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这一过程既保持了核心价值的延续，又展

从亚非团结到全球南方合作：万隆精神的规范演进与当代价值

现出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区特点的适应性。如东盟方式、非盟原则、金砖机制等，均为万隆精神本土化的成功范例，充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范建构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当前，万隆精神的实践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其一，在规范本体层面，主权平等与协商一致原则为全球南方突破“中心—边缘”治理结构提供了法理依据。其二，在实践路径层面，“求同存异”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大国博弈拓展了战略空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扩员等机制创新，为受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掣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多样化选择；中非合作论坛、非盟等制度化平台也为南南合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路径。其三，在价值指向层面，万隆精神正从区域治理规范向文明对话范式演进。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全球挑战，其倡导的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理念，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应对方案。

然而，面对国际秩序重构的关键窗口期，万隆精神的创新转化仍然需要着力破解三大悖论，即规范普适性与区域特殊性的调适困境、发展优先原则与全球气候正义的价值张力、南南合作机制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兼容难题。为此，全球南方国家需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实现突破。

在认知层面，应将万隆精神从历史遗产转化为前瞻性治理思想，建立涵盖数字主权、人工智能伦理等新兴议题的规范框架。技术革命正在深刻重塑国际权力格局，发展中国家必须在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中发声，避免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中被边缘化。具体而言，可通过多边机构推动制定保护发展中国家数字主权的国际规则，确保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既保障隐私安全，又不阻碍技术发展和数字贸易；推动建立南方国家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伦理共识，在相关规则制定中表达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取向；深化数字技术领域的南南合作，通过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切实缩小数字鸿沟。

在机制层面，推动区域组织跨区域联动与网络化协作。应推动非盟—东盟—拉共体三方联动，构建跨区域的危机响应网络。当前全球治理仍以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为主体，发展中国家亟须建立自主的合作网络：第一，建立非盟—东盟—拉共体三方建立定期对话机制，每年召开部长级会议，

就全球治理重大议题协调立场；第二，在南南气候基金和技术转让机制上形成合力，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统一立场，推动发达国家履行气候融资承诺。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达国家应在 2020 年后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资金，但实际履行情况并不理想。第三，在粮食安全领域建立南南粮食储备和预警系统，通过农业技术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粮食自给能力。第四，在公共卫生领域建立南南疫苗和药品生产合作机制，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推动完善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机制。

在话语层面，推动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与制度性权力转化。将全球发展倡议与非盟《2063 年议程》、《东盟共同体愿景 2045》等地区战略对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程序性权力向制度性权力转化。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更多扮演规则接受者角色，缺乏规则制定权。为此，应推动联合国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保障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坚持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使投票权更合理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重；在数字贸易、气候融资等新兴议题上，通过小多边与多边活动，确立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规则框架。

但是，万隆精神的当代转化并不是取代既有国际秩序，而是推动其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在现有框架内争取更多话语权和代表性。金砖机制、亚投行等新机制是对现有国际体系的补充而非替代。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既体现了万隆精神的包容性，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共同利益。

展望未来，万隆精神仍将在全球南方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大国博弈加剧、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加强团结协作，维护共同利益。总结历史经验、把握时代脉搏、创新合作模式，万隆精神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美好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陈雅慧）

at the continental level. As a key instrument for advancing African financial integration ,PAPSS aims to address the payment challenges in intra – continental cross – border trade. Its implementation is expected to reduce the cost of intra – African trade , decrease reliance on third – party currencies , resolve the fragmentation of existing African payment systems , and support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Despite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weak electronic payment infrastructure ,lack of necessary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and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PAPSS holds promising prospects. The growing sense of internal autonomy in Africa and the burgeoning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provide a favor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echnical guarantee for the full operation of PAPSS. Moreover ,China could incorporate PAPSS into the framework of China – Africa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cooperation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enhancement of both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of PAPSS in Africa.

Keywords: Pan – Africa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cross – border electronic payment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financial integration

Author: Lu Yamin , Ph. D. candidate at the Africa Research Center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 .

From Asian – African Solidarity to Global South Cooperation: The Normative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Bandung Spirit

Pan Yue

Abstract: As a historic conference of Asian and African nations striving for independence in the post – colonial era ,the 1955 Bandung Conference established the Bandung Spirit ,which has evolved from a regional norm to a global guiding principle. By combining norm theory with histor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Bandung Spirit ’ s transformation from an Asian – African solidarity concept into a norm for Global South cooper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normative evolution of the Bandung Spirit follows a triple pathway of “subject shaping – platform diffusion – institutional internalization”: norm entrepreneurs like Indonesia creatively combined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emands to propose a normative framework aligned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ests; multi-layered multilateral platforms constructed a normative dissemination network extending from the Asian-African region to the global sphere; norms were internalized from concepts to actions through policy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intensifie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rising unilateralism, the Bandung Spirit provides crucial guida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maintain strategic autonomy, promot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and reconstruct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articularly in emerging field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public health, and digital governance, the Bandung Spirit demonstrates a paradigm shift from political consensus to technical coordination and from conceptual advocacy to collaborative action, providing vit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fairer and 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Keywords: The Bandung Spirit, normative evolution, Global South cooperati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der

Author: Pan Yu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Deputy Director of Center of Indonesia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Research on Legal Protection for Overseas Business of Chinese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vestment Security Needs in Africa

Li Yumo

Abstract: Chinese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have assumed some governmental functions in safeguarding overseas interests, maintain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nd mediating relations among major powers. While meeting security demands, their overseas operations face multiple constraints: To begin with, domestic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supporting mechanisms lag behind overseas business practices; Moreover, localized legislation in Afric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tringent with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regulatory oversight; Finally, the supply of legal services related to Africa remains inadequate,